



十八岁的美国少女乔伊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并因此收到著名作家J.D.塞林格的来信，两人堕入情网。但是不久后，五十二岁的塞林格便无情地驱逐了乔伊斯。乔伊斯在痛苦缓和后，重新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并成了杂志撰稿人。几十年后，她回顾往昔，写下了这本关于影响她一生的一段经历的书。



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美国] 乔伊斯·梅纳德 著 袁凤珠 郭莉芳 译

At Home in the World

Wednesday, May 17

I am a very grim and weary person
 nature, not only because a depression
 is quite cheerless; it is the people
 at least, ... why are they always
 lonely because I am so rarely find
 quite joyful. (I bet that
 me task up on the walls of church
 really.) It is the dilemma
 all for me, that I like to like
 me not raised by my parents
 a woman with a critical sense
 of X-ray glasses or--do
 that snow-child with the chip
 in everything. What all
 I know the word well, the
 and men are, to me, a rare
 kindred spirit, perhaps,
 a happier than I can say.

do what it should. I feel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almost
 I am in mine, with a dash in
 and no acre.



译林出版社



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美国] 乔依斯·梅纳德 著 袁凤珠 郭莉芳 译

AT HOME
IN THE WORLD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 (美) 梅纳德 (Maynard, J.) 著; 袁凤珠, 郭莉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2

(译林传记译丛)

书名原文: At Home in the World

ISBN 7-80657-308-9

I. 我… II. ①梅… ②袁… ③郭… III. 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7281 号

Copyright © 1998 by Joyce Mayn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F.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82号

书 名 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作 者 [美国] 乔伊斯·梅纳德
译 者 袁凤珠 郭莉芳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Picador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4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08-9/I·260
定 价 (精装本)1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隐私·塞林格·心理治疗

——读《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余 斌

读传记、回忆录之类，大约是我们窥探他人隐私的最佳途径——假如作者喜欢发掘或是愿意袒露隐私的话。大多数人都有了解同类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显得很过分，以致窥探隐私似乎也构成了我们对他人生活的好奇心的一部分（此所以那些披露隐私的书往往走俏，而冠以“绝对”之名的“隐私”曾经绝对地畅销）。当然，身为文明人或自居为文明人，谁都知道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社会、道德的约束无时不在提醒我们按捺住膨胀的好奇心。但是传记、回忆录之类却为我们提供了坦然分享他人隐私的机会，不必有侵犯隐私权的担心，也免去了现实生活中自尊心会带来的隐约的负罪感，在此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名正言顺闯入他人的私室。假如“绝对隐私”或等而下之的小报花边新闻之类令我们心生厌恶的话，那么一些经了较“严肃”处理的隐私，其诱惑似乎是难以抗拒的，尤其当它关乎你所感兴趣的人物——比如一位你心仪的作家——的时候。

乔伊斯·梅纳德女士的自传作品《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也许算不得一部在披露隐私方面如何大胆无忌的书（她有无数的前辈和同侪在这方面可以让她瞠乎其后）。照她的说法，这本书是对她个人经历的“研究”，写作此书的目的则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启迪女儿，引领她避开人生的歧途。换言之，这是要完成女性经验的某种传递。但是女性的经历、女性的经验似乎天然与“隐私”有更多

的牵连。一者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总是不可避免、非己所愿地处在“被看”的位置;二者女性由其性别角色所定,其经历多囿于个人私生活,恋爱、婚姻、家庭往往构成人生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人生体验的重心。既然个人经历的书写往往需要借助对一己私生活的详尽书写和充分演绎,隐私的披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了——所谓“隐私”正是与私生活而非什么“宏大叙事”相关联的。读者也许更习惯在男性作者的自传中捕捉其他的讯息,而在女性的自传中,他们有意无意间更易把阅读当做对私生活、对隐私的张望。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读者的热情中其实都不乏张望隐私的冲动。

不过,尽管《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中不乏隐私的成份,撇开其他的因素不谈,我可以断言,可视为故事男一号的杰里·塞林格注定会将读者的大部分注意力吸引过去。塞林格在中国算不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不过作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他在很大一部分读者中相当有人缘。爱屋及乌,因其书而欲想见其为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偏偏塞林格早已过起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自1965年后即再无作品发表,不仅自己绝口不谈个人生活,而且牢守“私家重地,请勿践踏”之原则,谁披露了他的个人生活,他便要请谁吃官司,有位为他立传的作家就因在书中引用了他的书信被他告上了法庭。在塞林格的严密防范下,他的个人生活对于公众已形同一部禁书,而通常的情形是,禁书总是更强烈地撩拨起读者的好奇心。现在梅纳德“擅自”将这“禁书”里的一页打开了。

经由对塞林格与自己短暂忘年恋情的追述,梅纳德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塞林格的肖像,它由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隐私)加上梅纳德的诠释构成。对于书中披露的那些隐私,不同的读者自可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然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梅纳德的眼镜来看塞林格,而她对细节的选择和解释对塞林格极为不利:这显然不是塞林格的拥护者乐于接受的形象,因为他与我们据《麦田里的守

望者》、《写给艾美斯的故事》推想出来的那个敏感、富于同情心的作者相去甚远。正相反，“这一个”塞林格不仅多疑，自我中心，对周围的一切持不信任态度，而且傲慢、虚伪（看他对作者父母、对邻居人前人后的不同表演），冷漠、自私（看他抛弃梅纳德时的冷酷无情）。作者甚至暗示塞林格是个玩弄少女情感的老手，他一再以优雅动人的书信打动那些涉世未深、充满幻想的少女，始乱之，终弃之（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塞林格后来又演出此类故事，梅纳德亦不会对这段短暂的恋情耿耿于怀且影响到她对塞林格人格的判断）。

正如梅纳德声称的那样，她的故事提供了关于塞林格的诸多信息，这在十几年来未曾有过（塞林格的女儿写过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其中披露的隐私较《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尤有过之，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怀疑梅纳德叙述的真实性，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看不出多少蓄意“抹黑”的意图，也不仅因为她提供的细节相当细致逼真，而且因为书中的“事实”符合我们对人性的一般理解。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塞林格不是神亦非圣人，普通人身上所谓“人性的弱点”他也有。所不同者，他是个异人、名人，那些弱点皆以异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他的专断、自以为是，他在与梅纳德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控制欲。梅纳德在打破塞林格神话的同时，也像许多涉及作家隐私的叙述一样，再度证明了所谓“文如其人”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虚构。小说中的人物是作家的虚构，书中的作家则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完成的虚构，作品无疑会向读者传递作者的信息，有时甚至是最重要最真实的信息，但书里的影像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绝非等价物，也永远不能完全重合，二者相加，才是全人。读《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这类书，乐趣之一，就是丈量我们的想象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如果窥探名人隐私有什么严肃正当的理由的话，那就是它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获得一份完整的理解。

遗憾的是，梅纳德提供的“事实”虽然可信，她的诠释却不那么

让人信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让塞林格站在了被告席上，她建立的道德法庭显然对后者不利，因为我们只能听到她的一面之词，而作为“被害者”，她当然不会给予“被告”“同情的理解”。梅纳德向读者道出了她的委屈，她所受到的伤害，她的挫折感，没人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然而我们同时有理由从塞林格的角度去揣想他在这段忘年恋之中可能会有的失落，尽管一个少女幻想的破灭与一个有阅历的中年男子的失落，就其对各自的伤害而言，也许不能等量齐观。毕竟，事情的结局是一个双败的局面——两个人都是输家。只是塞林格肯定不屑于降尊纡贵对簿公堂，梅纳德的故事于是成了对他的一次缺席宣判。

若是可以尝试采取同情立场的话，我们将塞林格的少女情结看做《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表露的执念的某种延续亦未尝不可：守望少年扮演少女保护人的冲动是他在虚伪世界中守护住一份纯真的幻想的折射；塞林格对少女的情有独钟则隐然泄露了他不能全然放弃对纯真人性的憧憬。从书中的描写可以推断，梅纳德固然是带着浪漫的幻想走到塞林格的身边，塞林格也是带着几许幻想开始他对梅纳德的追求。梅纳德成了守望少年幻想中的少女的替身，从第一封信开始，塞林格扮演的就是一个守护者、拯救者的角色，他的守望方式则是一连串的忠告。霍尔顿·考尔菲德担心少女坠入悬崖，塞林格则为梅纳德可能无法抵挡浮华世界的诱惑忧心忡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塞林格以他的一番劝导开始他的爱情追逐，而梅纳德想给女儿的劝导恰恰是，万不可让类似塞林格这样难以抗拒的男子闯入自己的生活。）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得到“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都会记着您的忠告”的回应后，塞林格在梅纳德这张“白纸”上欣然命笔。许多男子潜意识中都有创造女人的冲动，无知的少女是最好的对象，由于有以年龄、名声等等带来的二人关系中绝对的心理优势，塞林格对他必能成功显然居之不疑。唯其如此，塞林格不能容忍梅纳德违反他的意志，而成为

他的信徒几乎就意味着获得拯救。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塞林格后来表现得何以如此绝情,除了他受不了对他的权威的冒犯之外,他或者把梅纳德的自甘“堕落”(终未全然接受他的生活方式)看成浮华世界腐蚀力量的又一例证。当然,性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梅纳德也写到了这一点,不过这一个“洛丽塔”故事肯定投注了更多塞林格式的文人梦想。

幸而梅纳德没有把她的书写成一则始乱终弃的故事,这使《我曾塞林格的情人》不致沦为泄私愤的谤书。事实上,梅纳德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四十四年的经历,她很细致地叙述了她的成长,在此过程中遭受的挫折,尴尬,窘迫,种种“啮咬性的烦恼”。她写到了她的环境,酗酒成性、不得志的父亲,对女儿隐私怀有过分好奇心的母亲,她的男友、丈夫。她也坦率地写到了让她深感羞耻的饮食紊乱症,令她难堪的性经历。将这一切和盘托出的理由是,她“希望这样做能使其他人对他们自己说不出口的失败和秘密不再感到那么羞愧”。换句话说,她的写作是一次心理治疗——首先当然是对她自己的疗救。心理医生对付病人的主要手段是鼓励他将一切难言之隐说出来,就此而论,梅纳德是自己给自己当了一回心理医生。

构成这次治疗的项目很多,但如何面对与塞林格的那段情无疑是关键的关键。梅纳德说的没错,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而不是关于塞林格的书,然而从序言到引子到正文,塞林格几乎无处不在,那段情是她写此书的主导动机,花在这段情上的笔墨比其他内容(包括她的几任男友、丈夫)加在一起还要多,以至我们简直可以给此书另外一个书名——“走出塞林格”。此书书名曾译做“红尘难舍”,多少也有此意,因为这正是从梅纳德与塞林格关系中产生的命题,梅纳德难舍红尘,后者则蔑视乃至拒绝红尘。

很难说梅纳德是否走出了塞林格的阴影。她的自我诊断不无道理:她认为她的最大错误是放弃了真实的自我,一意扮演塞林格

希望她扮演的角色，这使她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自我分裂的状态（一边是塞林格的意志，一边是她的红尘欲念），彻底失去了平衡。然而她似乎仍不能平静从容地面对往事。证据是，谈及塞林格，她仍不乏怨愤之意，她不能对那段恋情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找不到理解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的一贯线索（塞林格前后判若两人），同时，我们也不知道她何以突然收回了她自称爱情故事完结之后二十多年来对塞林格一直怀有的敬意（参看“引子”）。我们隐约见到的，毋宁是类乎怨女的爱恨情结。

平心而论，梅纳德的外部环境的确让她心意难平。写此书时她已预计到她可能面对的压力——她是否有兜售塞林格隐私的嫌疑？事实上，此书刚刚面世，负面的批评就来了，有说她“没什么才华”，更多的则是对她披露塞林格隐私的责难。一片讨伐之声动摇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因压力而生的对立情绪显然部分地转换为对塞林格的反感。在接受巴西记者采访时，她对批评家反唇相讥道：“如果一个男人想让别人对他一字不提、一言不发，他就不该蠢到给年轻姑娘写信，邀她们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多年前，正是塞林格在信中说我有出众的才华，说我是天生的作家”——话中实有几分负气。

说到才华，梅纳德所拥有的也许并不像塞林格在情书中期许的那么多。《我曾塞林格的情人》缺少高远的意境，缺少对人生、对人性的开阔视景。也许长年写家庭、妇女专栏的缘故，就其免使女儿误入歧途的意图而言，她是完全达到目的了。美国评家的评价是过于苛刻了，至少此书展示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生动逼真的摹写能力。在我看来，《我曾塞林格的情人》固然算不上一部益人神智的书，却不失为一本有意思的读物。

自序

我想谈谈信件，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十多年来，我的母亲在给她的父母和朋友的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和我们家庭的经历。我把这上百页的、用打字机打的信件的副本当做母亲留给我和姐姐的最宝贵的遗产，对有幸读到这些信件的别的人来说，它们同样珍贵。

母亲的信件——信件的引文贯穿整个故事——为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而我父亲在和母亲六年的恋爱期间的信件也同样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些信件包括绘画、即兴创作的诗句及表达狂热爱情的篇章。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从信上可以看出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毫无疑问，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数年后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么一种关系中去。

我和姐姐在长大离家以后，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写信的家庭传统。我深深地感激罗娜·梅纳德，她一直保存着我同 J. D. 塞林格交往的那一年及以后的岁月中写给她们的信。过了二十多年再回头读这些信，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在海边拾到的漂流瓶。随着一阵巨浪，18 岁时的感情和话语又涌上心头。

一部分信件记录了我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段，有四十页左右，它们是我和 J. D. 塞林格从 1972 年 4 月到 1973 年 8 月的通信。早在我见到这位给我写信的人之前，我已经通过他的字里行间爱上了他。塞林格的文字有时滑稽可笑，有时温情脉脉，常常充满智慧、学识和惊人的预见力，正是这些文字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而持

久的感情,即使在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之后,我对他的感情仍久久不能平息。

当我着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明白尽管 J. D. 塞林格给我写的这些信的纸张属于我,而信中的语言只属于他自己。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别的地方,他永远都不会允许他的文字被详尽地引用。

要讲述这个故事却不能完全再现信件的内容,这使我在刚开始时感到很茫然。尽管我一直很遗憾我无法和读者分享信中精确而又无法模仿的语言,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使人们去感受它们,感受那女孩收到信时所触发的感情。不能使用这些语言本身却要传递这些语言所激发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然而最终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做到。虽说对每一位读者来说不能直接读到这些信仍然是一个损失,但我相信我已经真实地再现了写信人的精神。

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我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详尽叙述发生在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的事情和谈话。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培养成一个观察者。父母鼓励我把周围所闻所见的特殊事物要像事实报道般地印入脑海。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的一生都不停地在心里做着记录。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也表明为什么我能精确地详述自己的经历。我尽力重新构筑起过去的对话以及所发生的事情的详情。尽管我不能发誓从那些纸上引用的每一个字都精确无误,但我相信如果有电影胶片或录影带实录了这里再现的故事的话,那一定会和这里所报道的一切惊人地相似。

我对一些人名作了更改。在少数情况下我重新安排了事情的发生顺序,或是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而且无助于读者理解我的人生旅程的细节。我毫不怀疑有人会认为我如实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然而我尽量只描述那些和我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和经历,我相信我有权和盘托出:因为它们是我自己的故

事。

有些人认为,作为十几岁孩子的母亲讲述书中这样的故事是不合适的。而我认为,如果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以真实为荣,他们就决不会成为诚实的人。在写每一句话时我都意识到有一天他们会读到它,并且我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念,即我不会讲述会改变我的孩子对父母的爱和理解的故事,以及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对父母对他们的珍爱产生怀疑的故事——那样的故事本来就不存在。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婚姻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还知道,它的奋斗和痛苦对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来说都不会成为绯闻。我祈祷,从我所讲述的故事中,我的孩子能从我年轻时经历的羞耻中得到解脱,并且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孩子、女人和男人都应该有权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或唱出他们的心声。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当我坐下来开始讲述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一封信的故事时,我想起这些年来我收到的所有读者来信。

第一封信警告我倾听读者的声音有危险。事实上,正是这些声音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一直支持着我。它们提醒我为什么我要写作,并对我的写作做出反应。没有什么影响能像读者来信那样促成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阅读并对我所写的专栏和《家庭生活》通讯作出反应的读者,以及每天与我分享咖啡时间的网友。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乔·罗森和默纳·尤里格不遗余力的照料和细心而机敏的帮助,这个网站就不可能存在。

独自在房中写作的几个月里,我大声地读出书中的篇章并拿给朋友和读者们看,他们的评论和建议对本书叙事方式的形成至关重要。我要感谢纽约州布鲁克林的维基·斯基帕斯;密歇根州卡拉马祖的莉拉·福克斯;佛罗里达州圣匹兹堡的汤姆·格里本;田纳

西州纳什维尔的苏珊娜·克拉克；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林·奥利弗；佐治亚州萨凡纳的罗斯玛丽·丹尼尔；俄勒冈州坎农海滩的比利·赫尔兹；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麦克·米尔斯；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瓦利的帕蒂·赫基；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杜布·科尼特；加利福尼亚州奥林达的杰克·扬；新泽西州雷德班克的盖伊·诺顿·埃德尔曼；华盛顿特区的莱斯利·古德曼—马拉马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罗尼·罗杰斯；纽约州纽约市的约翰·斯蒂克尼；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盖尔·维纳布尔；马萨诸塞州安德奥弗的朱莉娅·斯科尼尔；纽约州东汉普顿的弗朗西斯科·塞恩斯；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吉姆·阿瑟顿；新罕布什尔州布雷德顿的劳丽·伯查，布雷德福；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玛丽·基勒；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汤姆·勒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比尔·拉特纳；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克里斯·齐诺维奇；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曾顿的斯蒂芬·海纳曼。

菲利斯·西拉多克斯，杰里·伯特，莉拉·哈德利，凯西·卡尔，格伦·佩弗，以及杰西卡·克里斯特慷慨地为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并让我分享他们的经历。丽萨·帕拉迪斯和内奥米·舒尔曼在许多细小而重要的方面给了我帮助。

在此书的准备过程中，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的金姆·马克瑞斯提供了宝贵和细致入微的意见。约翰·格尔森博士，玛丽·斯图尔特博士和斯蒂芬·纽马克博士的帮助丰富了我对自己和这个故事的理解。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瓦利的朗尼·巴巴克博士发现了书中所缺乏的东西，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我特别感谢我亲爱的朋友、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的前治疗专家佩吉·卡比，他不仅帮助我回顾过去，而且使我从过去的樊笼中解脱出来。

我的朋友肯·伯罗斯提供了法律方面的真知灼见和道义上的支持。希瑟·弗洛伦斯在版权法解释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指导，他还对书中语言的微妙含义和我的手稿表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大的耐心。

伦纳德·瓦格曼是我信赖的法律顾问,尽管他毫无疑问向我提供了最明智的忠告,我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在我们多年交往中他所给与的广泛而亲切的支持,或者说他的支持对我有多么重要。只要有伦纳德在电话的那一端,我就永远不会有失去父亲的感觉。

约瑟夫·麦克尔罗伊是我从小到大的伙伴,在我母亲临终前他曾向她保证他会悉心照看我,他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他转变了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马格丽特·洛一史密斯负责编辑我时不时地在《万事想周全》上发表的小故事,她每个星期天早晨都专心致志地聆听我从远方大声朗读我的作品,电话中传来孩子们吵着向她要华夫饼干的声音,但她从不走神。我从未遇到过比她更好的听众,或是有谁更懂得讲故事的韵律。

俄亥俄州新不来梅的吉姆·迪克第二是一位老读者,在这本书最后关键的几个月的工作中他给与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使我解除了忧虑并放下其他工作,这是我以前根本做不到的。他这样做不仅是用新的方式给与必要的财力支持,而且是一位读者赐予我的巨大而令人振奋的信任。

李和凯西·拉森夫妇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长期读者,他们向我提供了俄勒冈州坎农海滩的住房,使我得以在一个漫长而多雨的冬季独自一人住上大半的时光潜心创作。这本书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间屋里创作出来的,从那儿可以看到黑斯泰克岩和太平洋。我还要感谢那些每个星期一的夜晚在坎农海滩美国退伍军人大厅演奏的所有音乐大师们。我的每一部作品都配了乐。这次的配乐由坎农海滩的弦乐和打击乐演奏家演奏,并由旧金山卫斯理教会赛西尔·威廉斯牧师的合唱队超凡脱俗的福音演唱为其伴唱。

海迪·马亚诺和吉姆·拉弗蒂在我外出工作的时候悉心照料我的儿子们。海迪的母亲埃斯特拉·马亚诺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照顾着我。

我的儿子查理和威利·贝瑟尔鼓励我去俄勒冈写书，我不在家的時候他们毫发无伤，当我回家时他们像欢迎英雄一样迎接我。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姐姐对我的赞同和理解，我将无法完成我要做的事。

我的代理人和朋友盖尔·霍克曼在我需要的时候激励我，始终如一地维护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靠着她对关键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天赋，盖尔无数次地引导我做出一个作家所要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不仅是商业决定，而且还有编辑方面的决定。

黛安娜·希金斯，我的编辑，在我的写作正处于无人过问的时刻找到我，表示希望跟我合作。这部书超出我以前所写过的任何东西，它表现了一名作家和一位编辑的真正合作。黛安娜不仅检查这本书每一个阶段的修改，事实上她对书中的那些修改起了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反映出她细致敏锐的倾听和审视的痕迹。同她一起工作的经历使我永远地改变了自己的文体。

最后，我想谈谈我的父母，麦克斯·梅纳德和弗雷德尔·布鲁塞·梅纳德。叙述到他们时，他们的一些阴暗纷扰的往事一齐涌现出来。若要表现这两个性格既复杂又相互冲突的人物而又不把这些事说出来，就只能采用我父母教给我的杜撰的办法，这正是他们在生活中所采取的自欺欺人的办法。这个故事中的有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特别是对那些认识和爱我父母的人来说。同时我也相信，尽管是痛苦的，但父母理解甚至祝贺我终于能够像现在这样自由地写作。倘若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把我抚养成人，我将不具备讲述这个故事的条件；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就不可能讲出我家庭的故事，也不可能叙述出父母对我和姐姐的那种非同一般，有时甚至是伤害性的教育方式。我的父亲教我如何观察，我的母亲把笔放入我手中。正因如此以及许多其他原因，我永远热烈而真挚地爱着他们。

引 言

18岁的时候我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它的题目是《18年华回首往事》，刊登在《纽约时报星期专栏》上，封面还登了我的照片。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自己在60年代的成长历程，表达了自己对周围一切感到厌烦从而与之疏远的思想感情。我讲到想要搬到乡下去住，远离尘世。我写道：“隐逸生活听上去很吸引人。”

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表示极为喜欢我的文章，并对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可能会被人利用表示担心。J. D. 塞林格很多年前就已隐居乡下，住在山顶的一所房子里，他就是在那儿给我写的这封信。

那年春天我一直忙于和塞林格通信。我爱上了他信中的声音，学校一放假我便拜访了他。几个月后我离开大学搬到了他那里。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和他住在一起，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投入一部书的创作，我确信——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35岁——我们将永远不分离。

就在我的那本书《往事回眸》出版前不久，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塞林格把我打发走了。可我仍然十分强烈地爱着他。

二十多年来我始终对一个和我早已断绝来往的男人怀着敬意。J. D. 塞林格与我的亲密程度不亚于我所信仰的宗教与我的关系。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退出我的生活之后很长时间对我生活各方面的形成仍有很大影响。但是我把这段经历收藏了起

来,就像我把他写给我的信收藏起来一样。

我努力继续向前走我的人生。离开杰里·塞林格一个月之后,我用《往事回眸》赚来的钱购买了一座带有 55 英亩土地的农舍,它坐落在一个没有一个我的熟人的陌生小镇的一条死巷的尽头。我在那里独自居住了两年半。

在纽约市我找到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我恋爱并结了婚。我丈夫和我生了一个小孩,后来又有了两个。我们在自家的地上修了一个池塘,冬天有月亮的日子我们一起在上面滑冰。我的丈夫画画,有时也画我。后来他就不再画我了。

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出书。我努力工作,与人合伙驾车,做饭,无数次采访足球赛和小型联赛,给我们的孩子读书,陪他们一起玩耍,当他们在海水里嬉戏时,我坐在海滩上,眼睛紧盯着他们露出水面的头顶。我和丈夫为能继续生活在一起而不断吵吵闹闹。

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为杂志和报刊专栏写了大量文章以支撑这个家庭。母亲临终前我一直照顾她,我和姐姐因为照顾母亲的事争吵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都无法参加母亲的葬礼。就在那一周,我和丈夫分手了。

我离开了那所死巷尽头的房子。我和丈夫没有为房子的事发生争执,但是为了孩子的监护权我们进行了一场战斗。我又恋爱了,当爱情结束时,我又爱上其他男人。他们有些是很好的对象,有些却糟糕透顶。

我建立了一个新家。我交了一些好朋友,也失去了一些。我写了另一本书。我的儿子们教我如何投棒球。我的女儿在她的床头悬挂玫瑰,并以她自己为榜样教我如何敞开心怀迎接世界,做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豁达的人。

我在花园里种植了花草。我们还养了一只狗。我教会很多女